

江苏镇江大港吴国遗址群聚落形态及相关问题

许鹏飞¹ 何汉生² 宁娜³ 张新香⁴¹

(1.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2. 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3. 镇江博物馆 江苏 镇江 212002;

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摘要】: 宜侯矢簋以及后来的诸多考古发现表明, 镇江大港沿江地区为吴国遗存的重要分布区。孙家村遗址发掘后, 考古人员对大港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 并勘探了谢家神墩、南神墩、东巨、断山墩、东庵前等遗址。大港吴国遗址群的年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 聚落规划明确, 布局有序, 是吴国西周早期的中心性聚落群。西周以后, 大港吴国遗址群虽然不是吴国的政治中心, 却始终为王陵区、经济中心, 在吴国的兴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 镇江 吴国 王陵区 聚落形态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镇江大港吴国遗址群位于江苏省南部的镇江市东郊大港周边地区, 北临长江, 区域面积约 80 平方千米(图一)。这一区域有两条山脉: 从雩山向东沿长江南岸由粮山、青龙山、北山、烟墩山至鬲山; 向东南由龙王山、马迹山、正干山、水晶山至黄山, 为宁镇山脉的东端, 最高的鬲山海拔高 258 米。两条山脉间包夹的三角形区域是典型的丘陵地貌, 海拔大多在 7~30 米之间, 两条山脉间的流水汇入太平河。

1954 年, 宜侯矢簋的意外出土是江南地区商周考古的重要事件, 此器主要记载分封虞侯矢于宜地之事, 唐兰先生考释此簋为西周康王时期之器物, 虞侯矢为姬姓之虞, “虞”通“吴”, 虞侯则为吴侯, 矢应是周章^[1]。《史记·吴太伯世家》: “是时周武王克殷, 求太伯、仲雍之后, 得周章。周章已君吴, 因而封之。”^[2]出土宜侯矢簋的镇江大港地区第一次与吴国、吴文化产生了联系。

1957 年, 尹焕章等人系统调查了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的遗址, 第一次提出了谏壁大港沿江区的概念^[3], 这也是第一次从聚落分布的角度确认了大港聚落群的存在。

20 世纪 80 年代, 镇江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发掘了母子墩^[4]、磨盘墩^[5]、北山顶^[6]、青龙山^[7]、王家山^[8]、粮山^[9]等数

作者简介: 许鹏飞(1983—), 男, 内蒙古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新石器时代考古。何汉生(1978—), 男, 浙大城市学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长江下游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宁娜(1989—), 女, 镇江博物馆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 青铜时代考古。张新香(1982—), 女,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 青铜时代考古。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苏镇江孙家村吴国铸铜遗址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17BKG016)的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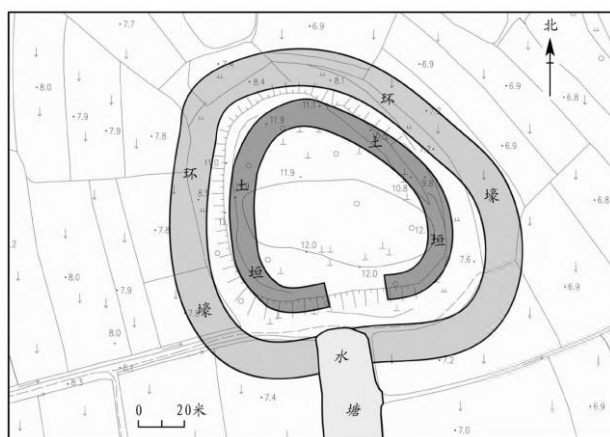
座西周、春秋时期铜器大墓。有学者考释，母子墩土墩墓主人为周章之子熊遂，北山顶春秋墓主人为吴王余昧，青龙山春秋墓主人为吴王僚^[10]。至于出土宜侯矢簋的烟墩山，遗址性质、器物年代曾经争议较大，李学勤先生修改了自己原有看法，判明烟墩山当为一座大型土墩墓；他同意唐兰先生观点，即宜侯矢簋为康王时代之器，只是他认为矢是周章之子熊遂^[11]。不论怎样，烟墩山和母子墩两座土墩墓为西周早期吴王陵已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除大型墓葬外，大港沿江范围内断山墩^[12]、左湖^[13]等遗址的发现及发掘，使得学界初步明确镇江大港沿江地区为吴国境内一处重要区域。



图一//大港吴国遗址群位置图

二、大港吴国遗址群的发掘与调查

孙家村台型遗址始建于西周早期，废弃于春秋晚期，在台地外侧挖环壕，边缘堆筑土垣。发现窑址、陶范、石范等与铸铜有关的遗存，还发现斧、铤、戈、刀等青铜兵器及工具。此遗址应为青铜兵器、工具铸造之地，是一处明确的青铜器生产地^[14]。该遗址的发现不仅为冶金考古研究提供了资料，也说明孙家村所在的镇江大港沿江地区是一处规划有序、遗址分工明确的聚落群。该聚落群不仅包含高等级墓葬群和居址，也是吴国的重要经济中心和手工业中心，甚至可能是早期的政治中心。因此，从 2016 年开始，镇江博物馆开始对大港吴国遗址群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及勘探。



图二//谢家神墩遗址环壕、土垣平面示意图

镇江博物馆孙家村考古队对大港地区的谢家神墩、南神墩、东巨、断山墩、东庵前遗址进行了初步勘探。勘探的重点是了解遗址的堆积状况和整体布局，探查是否存在类似孙家村遗址的环壕、土垣布局，研究当时的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

谢家神墩遗址南距孙家村遗址约1千米，高于周边地面约6米，平面大致呈椭圆形，底径东西长约77、南北长约72米，面积约4500平方米。钻探显示该遗址地层堆积厚3.5~4米。地层起伏不平，发现有土台、灰坑等遗迹，文化堆积特征与孙家村遗址基本一致。台地外侧有环壕，口距地面约1、宽10~15、深1~3米。环壕内有纯净的青灰色淤土。台地边缘有土垣，环绕着台地，南侧有一个缺口。土垣用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高约3米，直接筑于最早期地层上，未发现基槽（图二）。

南神墩遗址东南距孙家村遗址约4千米。高于同边地面2~4米，顶面漫坡状，中部高，四周略低，平面呈椭圆形，底径东西长约92、南北长约96米，面积约7500平方米。遗址外侧有环壕，口距地表深约2米。环壕宽10~15米，东侧呈浅凹槽状，深约1米；西侧深约2.5米。环壕内有青灰色淤土，较纯净。台地边缘有土垣，用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宽约10、残高0~1.8米（图三）。

东巨遗址平面近圆形，底径长约110米，面积约9500平方米。遗址高约4米，顶部较平整，海拔9~10米。环壕呈环形包围着台地，口部距地表0.5~2、宽10~15、深1.5~3米。环壕打破生土，环壕内淤土细腻纯净。土垣位于遗址顶部边缘位置，用纯净的黄土堆筑，残高0.5~1.7米（图四）。试掘探沟两条，解剖发现土垣，截面呈梯形。土垣筑于周代以前的早期地层之上。出土遗物丰富，时代从西周至春秋晚期。

断山墩遗址台地呈马鞍形，由南、北两个椭圆形台地组成，高于周边地面7~9米。南北长约225、东西宽约110米，面积约2.5万平方米。台地边缘未发现土垣。东侧及南侧钻探发现有浅环壕，环绕着台地边缘。环壕口距地表深1.2~2.5、宽10~15、深1.6~3.2米。环壕填土为青灰色或黄灰色淤土，十分纯净（图五）。

东庵前遗址位于柘山河西侧，平面呈弧角三角形，高约5米，面积约4300平方米。该遗址台地已被推平，钻探显示台地的地层堆积已不存，仅在周边发现有环壕（图六）。

三、大港吴国遗址群的初步认识

通过勘探以及以往的考古发掘，我们对大港吴国遗址群有如下的初步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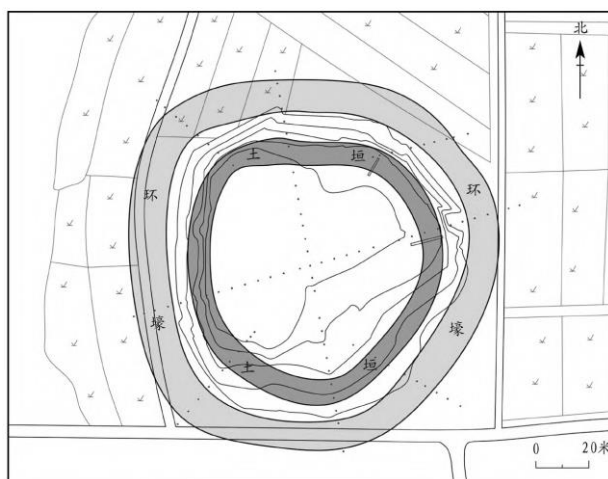
第一，发掘、调查显示这一区域的遗址及土墩墓的年代一致，均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各遗址的形成和废弃年代相近，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可确定皆是吴文化遗存。

第二，大港吴国遗址群的聚落规划明确，布局有序。总体上看，大港吴国遗址群可分为三个区域：北部为王陵及贵族墓葬区，东部为贵族墓葬区，中南部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遗址区。

除烟墩山、母子墩、青龙山、北山顶这四座王陵外，分布于遗址群北部长江沿岸的粮山^[16]、祝赵双墩^[16]、磨盘墩^[17]、王家山^[18]等土墩墓皆是大型的一墩一墓型土墩墓。土墩墓可分为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两种形制，就目前的发现看，一墩一墓的等级高于一墩多墓型。上述土墩墓又出土数量可观的陶瓷器或青铜器，但墓葬形制、规格，以及随葬品的种类、数量不能与吴王陵相提并论，也没有发现烟墩山、母子墩墓葬中出土的宜侯矢簋、伯簋等重器，及青龙山、北山顶的墓道、殉人等特殊类遗存。王家山墓葬被发掘者定义为贵族墓葬，本文赞同该观点，此类墓葬皆为高等级墓葬，其身份应为贵族。



图三//南神墩遗址环壕、土垣平面示意图



图四东巨遗址环壕、土垣平面示意图

断山墩遗址东部的三座一墩一墓型土墩墓皆已发掘，大笕斗土墩墓出土原始瓷器 26 件，青铜剑、铜凿各 1 件，时代为西周后期偏早阶段；小笕斗土墩墓墓室随葬 25 件遗物，以原始瓷为主，其他为硬陶器，应为西周前期偏晚墓葬。小笕斗墓没有出土青铜器，但简报作者认为该土墩墓出土的原始瓷器也是墓主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具有相同的意义^[19]。马脊墩土墩墓出土原始瓷 64、印纹硬陶 5、车马器 6、铜饰件 23 件，时代为西周晚期^[20]。可见，从西周前期偏晚开始，断山墩以东地区成为一处等级较高的土墩墓分布区。

台地遗址均位于太平河各支流两侧，分布无明显规律，与地面的相对高度仅数米。南神墩、东巨两个遗址的台地边缘发现有土垣，土垣高度较矮；皆存在环壕，深仅 1~2 米。谢家神墩与孙家村遗址位置接近，大小接近，遗迹布局十分相似，地层堆积特点及包含物也很接近，推测同属于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他遗址应为居住址。在东神墩遗址 400 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若干座面积在 20 平方米左右或者更大的房址，同时发现数量可观的陶瓷器，以及少量的青铜镞、石器^[21]。在宁镇地区历年来台形遗址发掘中，大、中型房址发现较少，更没有在发掘面积较小的情况下发现如此之多的遗物。笔者认为，生活在该遗址的人群的地位可能比较高，这里可能是一处高等级聚落。综上，中南部的遗址群至少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居住区；一类为手工业生产区。另外，从东神墩遗址情况看，其居住人群身份较高，与部分土墩墓的等级相匹配，这暗示着土墩墓上所葬之人生前应生活于大港

图七//大港吴国遗址群

第三，断山墩遗址为吴国早期都邑“宜”的可能性最大，是吴国早期的政治中心。

李学勤先生指出：“周王命虞侯矢‘迁侯于宜’，说明不是初封，而是徙封，或者说迁国。”^[22]“宜”应为一座都邑性质的聚落。通观中国先秦时期王陵与都城距离，由于道路条件、车马运输速度、尸体保存能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两者距离较近，时代越晚，两者的距离可能会越远。良渚文化反山墓地位于莫角山宫殿基址的旁边^[23]。从山西陶寺遗址平面图看，陶寺文化M3015、M3072等具有“王”性质的大墓距小城大概500米^[24]。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仅发现1座大型墓（VD2M1），该墓位于二号宫殿基址以北偏东处，距北围墙0.9米^[25]。殷墟王陵位于武官村和侯家庄，东南距小屯宫殿宗庙区约2.5千米^[26]。西周时期，未发现周天子之墓。诸侯国方面，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距I区墓葬约300米，距II区墓葬约500米^[27]；邢国核心聚落群为河北南小汪遗址，距高等级墓葬区葛家庄约4.5千米^[28]；郑国王陵位于郑韩古城西城的南部，相距不到1千米^[29]；从秦公陵园与国都雍城平面图看，两者距离不足6千米^[30]；战国时期田齐王陵位于山东临淄齐故城城东南约11.5千米处^[31]。所以，西周早期的“宜”地与烟墩山应该相距较近，当位于大港沿江区内。

遗址面积是判断聚落等级的重要指标。2.5万平方米的断山墩遗址是大港吴国遗址群里面积最大的聚落，同时也是先秦时期宁镇地区的大型聚落之一。根据面积大小，断山墩遗址应该是大港吴国遗址群等级最高的聚落。勘探发现该遗址外围不带土垣，且环壕较浅，基本不具有防御功能。断山墩遗址的这种聚落特点与二里头遗址有些类似，因其为中心性聚落，周围聚落环绕，反而对军事防御功能的需求不强烈，具有二里头时代至汉代中国大型都邑一般不设防的特征，即所谓的“大都无城”^[32]。断山墩遗址离烟墩山约8千米，又始建于西周早期，笔者认为断山墩遗址为吴国早期都邑“宜”的可能性最大。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证实。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港吴国遗址群为吴国早期的政治、手工业中心，也是王陵所在地，吴国在大港地区崛起（图七）。

四、吴国都城的变迁及大港吴国遗址群的作用、地位

西周中期，大港吴国遗址群的南部约30千米处发现葛城遗址，该遗址中心部分为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城址，发现有城墙、城门、壕沟。该城址建于西周中期，废弃于春秋晚期。发掘者认为该城址为吴国政治中心从宁镇地区迁往太湖平原地区十分重要的一个节点，可能为吴国都城^[33]。李学勤先生指出，周公平定三监之叛后，叛周的奄人南移，周王为了加强对东土的统治而在江南册封诸侯，这就是宜侯矢簋铭文中封“宜”的缘起^[34]。换言之，周王分封吴国的重要目的就是加强吴国的力量，以针对奄人。淹城遗址的发掘表明：该城址建于西周晚期，废弃于春秋中期；遗存面貌与吴文化有一定的差异。发掘者认为，越绝书所载的“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的记载可能符合史实，淹城应是淹的方国中心，而“淹君可能就是春秋早期被吴所灭的小方国的君主”^[35]。

张敏认为，位于安徽芜湖的鸠兹城遗址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吴国都城，建造该城可加强对大工山矿冶资源的掌控，又可西伐荆楚、东控于越^[36]。

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已经迁至太湖地区的阖闾城和姑苏城。《吴越春秋》：“阖闾曰，‘善。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37]阖闾城的建造目的很明确，即“以威邻国”，对越充满了敌意。张敏指出，“阖闾迁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攻越，因而阖闾城既表现出都城的布局 and 规模，又表现出强烈的军事性”^[38]。至于姑苏城，吴越两国反复争夺，其作为吴国都城的军事性质非常明确^[39]。

综上，西周早期以后吴国都城的建造是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建造目的明确，军事性特征十分明显。而大港吴国遗址群未见明

显的军事特征，与前者差别比较大。

大港吴国遗址群在西周中期以后不再是国都所在地，但其重要性并未降低。《史记·伍子胥传》：“后五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败吴于姑苏，伤阖庐指，军却。阖庐病创将死……是夕，阖庐死。”^[40]《越绝书》：“阖庐冢，在阖门外，名虎丘。”^[41]可知阖闾突然战死，为就近仓促安葬。《吴越春秋》：“夫差既伏剑，越王以礼葬之秦余杭山卑犹。”^[42]夫差之墓为勾践建造，阖闾与夫差两墓的建造皆不是正常情形。除此之外，现在已知的吴王陵皆位于大港沿江区。值得注意的是，大港吴国遗址群在西周中期以后不再是吴国国都区域，但吴王余昧和僚也葬于此，这表明大港吴国遗址群始终为吴王陵墓区。因阖闾与夫差之死比较特殊，葬在王陵区之外也可理解。

南京六合程桥东周墓^[43]、宽广墩^[44]、长山子^[45]等遗址出土有青铜兵器、容器等遗物，这些墓葬可能为吴国贵族墓；溧水大圩东村土墩墓^[46]、牯牛墩^[47]等土墩墓的体量较大，形制复杂，可能也是高等级墓葬。随着吴国疆域的扩张，贵族墓的分布范围也随之变大。但祝赵双墩、磨盘墩、粮山、王家山、马脊墩等土墩墓证实，大港吴国遗址群依旧是吴国贵族墓的重要分布区，同时也是吴国贵族的重要聚居区。

吴国素来以兵器精良著称，《战国策·赵策》：“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匝。”^[48]《楚辞·九歌·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49]

吴国带有非常明显的军事集团性质，张敏指出，吴国的先进性表现在青铜兵器制造水平、军事方阵以及军事思想方面^[50]。矿业是吴国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吴国最重要的生业形态，也是吴国称霸的经济基础^[51]。除了皖南地区可能为吴国的青铜开采与冶炼区以外^[52]，以孙家村、谢家神墩等铸铜遗址为代表的大港遗址群是吴国的重要青铜冶炼区，其铸造的青铜兵器是吴国强大和争霸的重要保证。这些表明大港吴国遗址群不仅是西周早期的政治中心，也自始至终为吴国经济中心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吴国晚期都城阖闾城、木渎古城，以及周边区域未发现任何与青铜制造有关的遗址，表明环太湖地区是吴国的扩展区，建立这些都城主要的目的为扩张与争霸。大港地区才是吴国的核心区域，为吴国争霸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从经济和精神层面讲，大港地区比后来的国都更重要。

某种程度上说，大港吴国遗址群与周原遗址性质很接近。在周原遗址内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群、铸铜作坊遗址、青铜器窖藏、大型墓葬等。徐天进指出，周原当是古公所迁之“岐下”，至文王“作邑于丰”后，这里虽然不是王朝中央驻地，但直至西周灭亡前，周原是周人祖庙所在，也是王朝诸多贵族的重要聚居地^[53]。“龙兴之地”对西周王朝而言依然很重要，武王灭商后此处虽不是首都，但称之为西周的另一处中心却也毫不夸张。大港吴国遗址群也是如此，至少称之为吴国的中心之一毫不为过。

五、余论

大港吴国遗址群在春秋末期全部废弃，应与吴国被勾践灭国这一长江下游地区重要历史事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王陵所在区、经济中心、“龙兴之地”的毁灭也标志着吴文化与吴国一同消失。

大港吴国遗址群的考古工作刚刚开始，这仅是根据文献及现有的考古资料作出的解释，笔者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会有更多的重要发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本文也是对吴国遗址群研究的粗浅尝试，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1]唐兰：《宜侯矢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
- [2]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446 页。
- [3]尹焕章、张正祥：《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第 1 期。
- [4]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的发掘》，《文物》1984 年第 5 期。
- [5]南京博物院等：《江苏丹徒磨盘墩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第 11 期。
- [6]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 年第 3、4 合期。
- [7]丹徒考古队：《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发掘报告》，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韵》，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0 年。
- [8]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 年第 12 期。
- [9]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出土的东周铜器》，《考古》1981 年第 5 期。
- [10]张敏：《鸱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东南文化》2014 年第 5 期。
- [11]李学勤：《宜侯矢簋与吴国》，《文物》1985 年第 7 期。
- [12]邹厚本、宋建、吴绵吉：《丹徒断山墩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0 年第 5 期。
- [13]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市左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 年第 4 期。
- [14]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市孙家村遗址 2015-2016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8 年第 6 期。
- [15]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粮山春秋石穴墓》，《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4 期。
- [16]a.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大港土墩墓发掘报告》，《文物》1987 年第 5 期；b. 江苏镇江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江苏镇江大港双墩 2 号墩发掘报告》，《南方文物》2010 年第 4 期。
- [17]同[5]。
- [18]同[8]。
- [19]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教局：《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文物》2000 年第 9 期。
- [20]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大港华山马脊墩土墩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 年第 3 期。
- [21]镇江博物馆：《镇江东神墩遗址发掘报告》，《镇江台形遗址》，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 [22]同[11]。

-
- [2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9 年，第 70 页。
-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 2002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第 157、158 页。
-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4 年，第 3 页，图一。
- [27]a.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房山县考古调查报告》，《考古》1963 年第 3 期；b.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 1995 年；c.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 1193 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 年第 1 期。
- [28]任亚珊、郭瑞海、贾金标：《1993-1997 年邢台葛家庄先商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 [29]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新郑县文化馆：《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 [30]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7 期。
- [31]张学海：《田齐六陵考》，《文物》1984 年第 9 期。
- [32]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 年第 10 期。
- [33]a. 镇江博物馆考古队：《江苏丹阳葛城遗址勘探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9 年第 3 期；b. 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阳市文化局：《江苏丹阳葛城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0 年第 5 期。
- [34]同[11]。
- [35]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等：《淹城——1958-2000 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194 页。
- [36]同[10]。
- [37]汉·赵晔：《吴越春秋》卷第四《阖闾内传》，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31 页。
- [38]张敏：《吴国都城新探》，《南方文物》2009 年第 2 期。
- [39]同[38]。
- [40]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1931 页。

-
- [41]汉·袁康：《越绝书》第二卷《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11 页。
- [42]汉·赵晔：《吴越春秋》卷第五《夫差内传》，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88 页。
- [43]a.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 年第 3 期；b. 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 年第 2 期。
- [44]刘建国、吴大林：《江苏溧水宽广墩墓出土器物》，《文物》1985 年第 12 期。
- [45]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浦口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1980 年第 8 期。
- [46]南京市博物馆、溧水县博物馆：《南京溧水大圩东村土墩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 年第 5 期。
- [47]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金坛区博物馆：《江苏金坛茅东村牯牛墩土墩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9 年第 1 期。
- [48]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战国策》，中华书局 2012 年，第 571 页。
- [49]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82 页。
- [50]同[10]。
- [51]张敏：《陶冶吴越——兼论两周时期吴越的生业形态》，《东南文化》2019 年第 3 期。
- [52]同[51]。
- [53]徐天进：《西周王朝的发祥之地——周原——周原考古综述》，《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 2003 年。